

“展望二十一世纪论坛”  
首次会议论文之十五

# 21 世纪的中国与亚洲 ——新西兰和南太平洋的看法

弗兰克·霍尔姆斯爵士

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荣誉教授  
新西兰 2000 年基金会名誉顾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办

1996 年 9 月 4~6 日

中国·北京

## 论文提要：

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地位不断增强，这种大趋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这些国家的迅速发展将继续为有所准备的人们带来机遇，而对不能适应竞争加剧和变化不定局面的人们来说则是困难重重。

过去十年间，新西兰捕捉机遇和适时应变的能力大有提高。新西兰进行了范围广泛的财经改革，减少公共债务；实行以低通胀为重点的货币政策；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化和私有化；取消过度限制规定，改革劳动力市场；大幅度减少海外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壁垒；从而国民经济的竞争力更强，灵活性更大。这样就加强了国内经济的基础，制造业和服务业以及初级产业部门便能够更有效地参与贸易和投资。政府也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可以致力于逐步减少以至最终取消壁垒，努力促进发展全球和区域贸易、投资和证券交易。

新西兰过去主要依靠向英国出口农牧产品，现在同亚太地区的贸易占其对外贸易的 75%。这一地区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大家进一步认识到，通过贸易、投资、旅游和建立合资企业推动发展，相互合作保障本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新西兰同亚洲特别是中国之间的相互影响将会继续发展。

新西兰及其邻邦等南太平洋小国都既要全力以赴又要通力合作，才能充分利用亚洲提供的机遇，才能对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政策施加某些影响。新西兰建立亚洲 2000 年基金会，反映出三方面人士都意识到新西兰需要加强其国民对亚洲的认识，需要加强同亚洲教育、传媒、文化和企业界人士之间的联系。新西兰同澳大利亚的《进一步密切经济关系协定》（1983 年）是“开放性地区主义”的一个范例。新西兰认为同东盟邻国加强经济与安全方面的合作必有好处。

近年来的历史证明，本地区未来发展前景看好，本地区大多数国家适应未来变化的能力也令人乐观。繁荣与和平的主要威胁来自顽固的保护主义，如果向整个地区扩展还会造成更大危害。有些国家威胁要动用经济或军事力量来达到其政策目标，这也危及本地区的繁荣与和平。

今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大国，特别是美国、中国、日本和欧盟的内外政策，以及大国是否愿意遵守普遍接受的规则公正处事和解决纠纷。为此，中国早日加入世贸组织十分重要。如果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能够真正实行自由化、促进与合作计划，并通过世贸组织推动欧盟和其他国家采取同样措施，各国调整的难度就会大大减少。美国仍将是主要的市场，但是其他国家必须在下一个发展阶段的进出口贸易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日本开始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希望其他国家采取适当的政策，以避免国际收支综合平衡出现大量顺差或逆差，尽量避免采取保护主义等不公平的做法。

新西兰十分重视通过全球和地区对话以及预防措施来维护和平，防止紧张关系进一步发展，因此支持东盟地区论坛和联合国维和行动。希望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赞成新西兰的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努力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普遍裁减军备。

## 1. 新西兰——从不列颠农场到融入亚太经济合作区

在过去 25 年中，新西兰无论是在对外方针还是在内部经济、社会政策上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从前，单一的农牧业产品出口严重依赖于英国，并受税率及英国货币区体系的束缚。而统计表明，目前新西兰的贸易、投资正在迅速地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将近四分之三的进出口贸易是面对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的。与亚洲的交往正逐步加

强。目前国内大约 40% 的多样化的产品均向亚洲出口。由于航运线的不断发展，游客和其他观光者频繁往来。

新西兰与亚洲的交往将会继续增加。由于亚洲地区的飞速发展以及日益上升的影响力，新西兰需要不断提高向这一地区提供所需的能力，这就需要从贸易、投资及旅游的角度探究双方各自的优势，不断增进了解，增加合作，以保持和平与繁荣。

中国政府和商界人士已开始对新西兰的改革和经济前景产生越来越大的兴趣。直到近期，与中国的贸易增长幅度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但是对中国的出口（包括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已令人兴奋地从 1990 年的 18300 万美元增加到 1995 年的 71700 万美元。（同期对台湾的出口额也由 26400 万美元增长到 63000 万美元）。更重要的是，除羊毛以外的其他产品的出口额迅速增长，而从前，羊毛是占主导地位的出口产品；从地理分布的角度看，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地区已经扩大；而双方国家的企业对对方的投资兴趣也在逐步增加。

由于两国间不断增长的投资热潮，特别是在牛奶、食品和饮料产品，以及林业和羊毛行业的合作不断增加，我们可以乐观地认为，到 21 世纪初期，中国将成为新西兰最重要的市场，以及潜在的资源供给国。

## 2. 中国和亚洲大趋势及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现在并不比过去更容易准确地预测 21 世纪将要发生的事情。在 20 世纪的前半期，经济进程受到了一系列大灾难的阻碍，如两次世

界大战以及大萧条。在本世纪的后半期，在许多国家都有了远远高于其初始状态的发展趋势。尽管如此，世界上的有些地方仍没有得到发展，包括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由于战争或内部冲突阻碍了其发展进程。

遗憾的是，我们还无法排除掉未来 25 年或 50 年世界将要发生的大变动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考虑这一点，至少在可能预知的将来，东亚，特别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以及他们在国际关系和地区事务中重要性的增加似乎还要继续。他们将持续保持高比例的国内收入并提高人们投资及有效地利用资方设备和信息技术的能力。

目前，有些亚洲国家仍然严重地依赖于狭窄的出口途径向亚洲以外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其商品。商品生产的竞争，特别是电子产品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有着相对自由的进口政策的国家也不希望继续提供一个让别人赚钱的重要市场。因此，持续发展将依赖于不断地调整经济以提高竞争能力并着手开发内部及外部新的市场。

因此，他们必须继续更加注重市场的作用，并在其经济体制中开放外部竞争机制，此外，还要发展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网络。这些网络，应依据其内部经济发展的实力而建立，从而改变过去仅仅依赖于出口的缓慢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样，他们才能保持持久地发展。

这种网络在中国目前高速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为现代化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技术提供了入口。这种发展似乎已被其国内主张改革的渐进主义者和实验主义者推

崇而不是排斥。但是，这中间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转换国有企业的福利责任；开发劳动力及房地产市场，为改革过程中从农业及其他行业中剩余的劳动者提供更好的机会；完善金融和货币体系，更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和控制投机买卖；解决不断严重的城市环境污染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可能导致政治的和社会的紧张关系，阻碍经济发展。但是大多数新西兰的中国观察家仍乐观地认为，中国将保持每年8—10%的经济增长率，并有可能在21世纪的前25年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之一。

### 3. 新西兰及南太平洋的机遇与问题

亚洲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亚洲出口的不断增长有可能对世界产生一些不利的影晌。但是，就近期历史而言，可以有理由相信，亚洲的发展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是有益的，而更多的注意力应放在其对环境发展的潜在的不利影响上。高速的发展对于那些不能或者不愿使自己适应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国家来说势必会带来诸多问题。但是，它也将给那些做好准备，将自己纳入地区发展网络并加强这种联系的国家带来机遇。

中国出口贸易现实的以及潜在的增长趋势已经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世界银行设在中国分支机构的皮特·伯特莱尔 (Pieter Bottelier) 指出，尽管中国的贸易额仅占世界贸易总量的2.5—3%，但是，在过去的五或六年中，它在世界贸易中的增幅却达到了20%。然而他并不希望中国如“亚洲小龙们”一样，仅依赖于出口取得发展。而罗

斯·加诺特 (Ross Garnaut) 和黄一平 (Yiping Huang) 在承认中国在世界贸易地位的增长是一种挑战的同时, 也指出, 它的规模和结构并不比已经 (也许还未完全) 遇到的日本及 NIE 的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更加庞大。我们还没有面临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受损的游戏 (zero-sum game)。但如果游戏的重要一方, 如中国能够象其巨大的出口规模一样成为一个更好的进口国家, 那么他们将很容易地解决其他国家也将面临的问题。

在过去十年, 新西兰掌握机遇以及调整转变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它形成了一种更具有竞争性, 更加多样化以及更具灵活性的经济体系: 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进行了更广泛的改革; 公共企业实行合并和私有化, 在商品、服务、资本及劳动力市场中取消了不合理的限制规定; 减少了对海外贸易和投资的障碍。这一切都有助于形成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基础, 由此, 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初级产品生产者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政策亦能更好地承担义务, 降低并最终消除外部障碍; 努力改善和发展地区间以及全球的贸易、投资和安全状况。

当然, 继续提高这种竞争力将依赖于连续不变的政策加以保持。正如著名的趋势分析家约翰·耐斯比特 (John Naisbitt) 指出的那样, 全球一体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减少了商业规模的优势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对人们不必要的控制。因此, 象新西兰这样一个小的不断市场化的国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容易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而对于充满活力与自由的亚洲经济, 则应很好地放置自己的位置以分享从这种

活力中萌发的机会。

#### 4. 增进理解与架设桥梁

政府在决定经济活动和对外贸易的规模和模式时仍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种作用伴随着我们迈入 21 世纪后似乎将逐步削弱。政府在教育 and 外交领域中仍然是有意义的角色，但是，具有建设性的私人参与将对于政府实现其目标越来越重要。

直到本世纪的后半期，新西兰仍遗留着许多英国殖民地的特征。这不仅反映在其经济的依赖性上，还表现于它的国内机构、惯例以及教育体系中的学校课程中。新西兰有理由为继承了英国人以及波利尼西亚人的众多特点而感到骄傲。但是现代新西兰人还没有准备好成功地与亚洲人交往的足够的技能。

在贸易、投资、安全等事务中，建设性的交往通常是建立在相关国家民众之间的理解与信任的基础之上的。新西兰政府早就认识到，如果他们要建立与这一地区的有效联系，就必须促使新西兰人更加了解亚洲的文化、市场及其语言。基于这一点，一个官方的“亚洲 2000 计划”（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于 1991 年草拟出来。鉴于考虑到这项计划必须要有管理上的和资金上的保证才能取得成效，因此，1994 年决定该计划分别由社会团体和教育社团来承担，同时设立了亚洲 2000 基金。在这项计划运作的头两年，确立了一系列有用的研究项目，涉及教育、传媒以及商业等领域。目前该计划已得到了来自公众和私人两方面资金与实际行动的大力支持。



当然，基金的主要部分是用于支持发展新西兰与亚洲的关系。例如，很多中学都开设了日语课程，但是中文和马来文亦是急需设置的课程，基金会便在这方面进行促进工作。令人鼓舞的是，人们已经认识到新西兰人与亚洲结合的能力需要进一步增强，社团和教育的影响力应当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战后初期，新西兰曾与其他国家一道为大量来自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提供教育帮助，以完成“科伦坡计划”（the Colombo Plan）和其他政府计划。如今，新西兰仍能为来自亚洲的人提供有效的学习环境。但是，新西兰人越来越认识到他们必须同样地向亚洲学习。这种人民之间双向的交流，在教育、传媒、商业及政府之间理解的增进与联系的加强，将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不仅成为新西兰与其亚洲邻国关系的重要成份，而且成为整个亚太地区未来关系的特点。

基于这一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出现无疑削弱了非政治性机构，如太平洋贸易和发展会议（PAFTAD）、太平洋地区经济理事会（PBEC）和太平洋经济文化中心（PECC）在未来的重要性，它的作用是增加地区间政府的合作。其学术、私人及三方合作的结构也许会改变，但这种合作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政治敏感地区，将不会减弱。

## 5. 小国间的合作和地区性开放

象新西兰这样的小国可以为自己做大量的准备，以适应全球和地区环境的变化，他们在生活与工作中必须充分考虑到与他人的合作。

就新西兰而言，与澳大利亚发展“更加密切的经济关系”（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CER）可以为实现一种预定的政策提供一个非常有用的阶梯，这一政策便是，改变进口特许制度并逐渐全方位降低单方面进口关税。CER是地区性开放的良好典范，它将在全球范围被广泛采纳，逐渐并最终消除地区合作伙伴之间或之中的障碍。另一个有用的范例是南太平洋小国之间的合作，“南太平洋地区贸易和经济合作协议”（The South Pacific Reg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SPARTECA），这一协议给予本地区弱小的从属性的经济以自由进入的能力，而在短期内不需要互换，更多的市场出口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非常欢迎泰国的创造性建议，他们提议建立CER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之间更紧密的经济合作是十分有价值的，随后还要促进并扩大亚洲自由贸易区（AFTA）的范围。目前，有关政府已确立了自己分享发展自由贸易体制的现代目标，并寻求一些相互间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可能性。相互间的对话对于发展官方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益的，并可为CER与东盟间的联系提供更好的基础，通过为整个地区所共同接受的成功地构筑亚太经济合作的宏伟目标。

作为一个迫切希望亚太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全的小国，在国力和影响极其有限，并且未与任何大的势力结盟的情况下，新西兰与东盟各成员国有许多相同利益。东盟地区论坛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媒介物，通过它可以在广泛的原则性问题上尽可能地达成共识，为保证地区安全与和平，解决潜在的纷争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 6. 潜在的问题以及紧张与分裂的根源

尽管近期的历史乐观地表明中国可以保持发展，但是亚洲和亚太地区一定不要忽略某些潜在的危机和紧张的根源依然存在，如果不能满意地解决，将会阻碍或瓦解发展的进程。对于经济的主要威胁来自于（a）损害国内生产竞争机制的内部政策或产生不可接受的巨大外部赤字或盈余；（b）大国中贸易保护主义集团说服其政府运用政治权力支持其保护立场。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如果具有地方主义色彩并发展为专门针对外部成员不公正限制的集团成份，那将是十分严重的。如果这种困扰状态阻碍了亚太经济合作的进程，或将太平洋分割成对峙的东西两半，或进一步阻碍世界贸易组织（WTO）中的贸易自由化，那么紧张状态定会升级。

大国政府通常迫于内部压力运用政治权力试图逼迫他国改变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倾销出口，或改变国内的政策及作法的迎合其自相矛盾的人权标准。尽管这种作法有时会产生效果，特别是对弱小国家，但它几乎必然会导致愤慨情绪和紧张局势。它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建立长期合作的目标。

人们希望地区中的大国应同小国一道，设计出一种更好的国际间或地区间规则及程序，作为解决大部分争端的基础。同样的作法可用于解决国内生产者间不公平竞争产生的纷争，并可用于反倾销或其他保护措施，伴随着其他障碍的减少，政府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使其求助于保护和特殊的特殊含义。国际间，特别是美国、日本及中国政府间应采取建设性的接触来解决问题，这样将极大地有助于排除潜在的紧

张根源和报复行为。

我们关于中国和亚洲能够持续发展的乐观设计也许有一天会被扰乱，如果该地区由于某些问题所导致的紧张局势不能和平解决的话。潜在的爆发点存在于朝鲜半岛（Korean Peninsula），斯普拉特利群岛（Spratlys）及其沿海；对统一的大中国的建成的不同意见；对于日本军事力量及中国核力量增长的恐惧。这些潜在的热点所引起的动荡的可能性是不容忽视的。从普遍的高技术武器经费的增长这一现象中，我们无法得出令人安慰的结论，即便大多数国家都打着以防御为目的旗号。分析家们认为，由于权力的对抗，伦理宗教的差异，以及市场和资源的竞争，这一地区将进入一个不可预知的动荡时期。在安全问题上采取建设性的行动以及实行经济优先的政策可以改变上述悲观的论调，并能增进信任，和平解决分歧。

## 7. 妥善处理问题的原则

### (a) 国内管理的责任

地区间政府和大型合作企业所奉行的对内与对外政策的类型是保证亚洲和中国大多数人民生活能否继续大幅度提高，而不产生别人难以解决的问题的关键因素。保持目前朝着更加开放性经济发展的趋势尤为重要。新西兰的经验显示这一趋势将有助于而不是阻碍发展。但它同时指出，外部障碍的减少必须伴随着货币和财政政策以不断发展的长期前景为目标，而微观经济政策应比以往更注重要求并帮助生产者适应国内外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这反过来意味着生产者将要求更

多的保护而不是竞争或要求政府的津贴。

这无疑将给每一个在国内政策中采纳这种方法的国家带来政治困扰。过去新西兰经常在临近选举之际迫于压力而放松财政和信用政策，并发现很难减少或转移对特别团体的支持或保护，这并非出于经济的考虑而是缘于被认为是一种权力。一次外汇危机为我们的政府彻底改变过去的作法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它无疑能更好地避免产生能够导致危机的问题。政治困扰显然影响了向更好的政策转变的速度，这一政策甚至可由社会团体制定，在那里统治者的权利更少地依赖于选举人的投票，而不似新西兰及其他具有相同民主程序的国家。但是在信息和资本流通领域发生的革命使得认识政策的严重错误的速度比以往更迅速。

这种考虑对于小国如何使自己适应于应付面前的挑战尤为重要。如果大国势力同样奉行良好行为准则，那么他们的任务就容易得多了。我们或许可以从近期同日本的对抗中得到启示，日本是战后亚洲迅速崛起的带头人。人们似乎一致认为，要想恢复国力，避免停滞，创造新的机会，就必须改革讨好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的政策。然而，改革进程一开始，就遇到了强大的政治阻力。变革的需求是为了使日本实现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的义务，它可为日本加速国内改革提供有效的催化作用，从而符合日本的长远利益。

近年来，日本已经在进行有助于减少紧张根源的努力，即它的十分巨大的对外贸易顺差。这曾使它与美国的关系成为最主要的不安定因素。如果这两个国家以及那些金融重要性在不断增长的亚洲大国

能够采取避免造成国际间巨大不平衡状态的对内对外政策，那么未来的紧张局势将会被消除，与此同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加强他们彼此间的合作，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

### (b) 建设性的外部合作

建设性的外部合作，特别是在大国之间，将对于本地区及全世界和平地迈入 21 世纪具有极大的贡献。如果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从其自身利益考虑接受逐步开放他们的进口和投资市场的现实，并且如果这种制定政策的方法被采纳，特别是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大国中，那么协调上述国家出口快速增长的问题就会变得极为容易。这种认同也将降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出现对立的可能，因为它们中的有些国家希望得到更大的自由度来选择其完成单方面贸易自由协定的进程的程度与速度，而有的国家则寻求更加规范的注重结果和目标管理的作法。对于北亚一些国家而言，农业的贸易自由化是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但他们在其行动计划中并非拒绝接受别国具有相对优势的重要产品，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及其他“石堆集团”（Cairns Group）的成员。

世界贸易组织包含了比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更广泛的成员国，这将更容易产生问题。其中最首要的问题是尽早允许中国加入这一组织，以便它可参与制定解决世界贸易体系面临的许多重大的问题的一致原则，而其自身的贸易和投资额也将构成越来越大的比例。出于某种自

身利益的考虑有人希望中国作为大国将从世界贸易组织所能提供的特殊条款中得到有限的帮助，有些人不明智地认为，应去帮助更加弱小的发展中国家。

早日使所有乌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协议的签字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将有利于亚太经济合作的发展，也将有利于达成另一个全球贸易自由化协议。许多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更愿意选择跨越障碍的多边贸易形式，但有时则发现由于某种政治因素导致不能实现互利互惠，特别是在与欧盟交往中。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应努力说服欧洲及美国效法他们给予亚太经合组织参与全球贸易，并接受到 2010 年消除多边贸易障碍的要求。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亚太经合组织消除敏感因素的障碍，而且还有助于化解不仅仅是区域性问题所带来的纠纷，如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以及其他正在出现的新问题。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就如同北美洲的情况一样，“东亚经济决策委员会”（East Asian Economic Caucus）的建立排除了这些国家从亚太经合组织中不必要的分裂。最近，这个决策委员会正在促成东亚各国间密切合作朝着跨国界的方向发展。

如果亚太地区的国家能够摒弃现有的政治隔阂，实现与朝鲜半岛，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可能的技术联络、高速的运输网络和多种形式的互利发展，那么将使所有国家从中获益。这种更密切地联系可以转化为共享的环境关系要求人们作出一致的回答。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一致认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国家之间进行平等磋商是具有价值的

(避免不利于合作气氛的有关安全问题的争吵同样重要)。他们还希望 CER 伙伴与东亚能够就全球经济政策达成共识。

正如已经指出的,在本地区的一些国家中正出现着从环境衰退到污染严重的不容忽视的威胁。这一问题将随着发展的进程变得越来越严重,除非我们立即分别地以及整体地采取行动,更好地保护环境,更有效的控制污染的蔓延,保护能源及其他资源。这是超出本篇论文主题之外的话题。但是,新西兰作为比其它亚洲国家更少地面临这些紧迫问题的国家,应逐渐认识到其自身需要更加关注环境保护,并有职责和能力参与本地区的整体行动。

新西兰还认识到,它的安全必不可少地依赖于集体的行动。在冷战时期,新西兰是“美澳新联盟”(ANZUS)的成员,参与了与朝鲜的冲突,并且是“五国防御协定”(the Five Power Agreement)的成员,与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结盟。它最近的集体性的努力反映了很强的倾向性,即支持和参与有助于避免导致武装冲突的协定。因此,如本文第5部分所阐述的那样,新西兰坚决支持由东盟地区论坛所构筑的更加合理的地区安全体系。新西兰还为联合国在波斯尼亚和索马里的维持和平行动作出了贡献。新西兰政府用于防御的开支仅占国内生产总值中极低的比率。但是正如特伦斯·奥布赖恩(Trence O'Brien)所指出的,在亚洲布置一个小型专业的适应性强的部队与对这一地区没有更多的政治意图有着本质的区别。

新西兰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政策,都坚决反对核力量。可利用的其他资源作为国内能源使其承诺不选择核能作为自己的需要。不允许



拥有核力量以及核武器仍然是恢复美澳新联盟的障碍。尽管如此，新西兰与美国和澳大利亚间在经济事务中的密切合作自 80 年代中便得到了加强。与澳大利亚有紧密的防务关系。与克林顿政府有良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新西兰与本地区其他政府一致认为，保护与美国在政治、安全和经济事务上的具有建设性的协约是非常重要的。

新西兰政府不赞成法国和中国继续进行核试验的作法。它非常重视今年成功地在极大的范围内完成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以及未来针对彻底全面销毁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而进行的国际性行动。在亚太区域内，更多地依靠美国、中国和日本的合作，朝着消除对抗保持和平的方向迈进。这种合作对于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其他国家军费开支的竞赛以及降低由于军事对抗而导致的地区或个别成员国发展的重大倒退的可能性都是极其重要的。

尽管有这么多潜在的危险需要避免，但是我仍然对向 21 世纪迈进的中国和亚太地区持有总体上的乐观态度。在任何情形下，新西兰都会致力于发展与亚洲人民，特别是与中国的长期的具有建设性的相互关系。我们必须鼓励这些国家继续实行开放政策并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地区和国际事务。

因此，新西兰需要更加努力地建立自己的伙伴关系以迎接一体化进程的到来。这种努力要在增进对亚洲不同文化、经济和语言了解的基础上不断加强。通过政府、商界、教育和研究团体三方面的共同努力建立更佳的合作联系，而教育和媒介的交流将为建立在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贸易、投资旅游和将来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补充。